

•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 主编 叶嘉莹
◎ 编著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辛弃疾词

新释辑评

(上)

楚天千里清秋
水随天去秋无际
遥岑远目
献愁供恨
玉簪螺髻
落日楼头
断鸿声里
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
阑干拍遍
无人会
登临意



中国书店



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上)
■责任编辑 ■陶 玮 吴 桐
■封面设计 ■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辛弃疾词

新释辑评上册

■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责任编辑：陶 玮 润 农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上下）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李史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97 千字

印张：52.125

印数：0000—3000

书号：ISBN 7-80663-358-8/I·189

定价：98.00 元

敬告读者

本丛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成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而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罗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陛”。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纯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西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选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之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辛弃疾（1140～1207年），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也是两宋词史上熠熠闪光的伟大词人之一。

辛弃疾所生活的时代，是“南共北，正分裂”的时代，是汉民族生存与发展遭遇极大危机的时代。“靖康之难”（1127年），宋王朝仓皇南渡。自此，南宋与金既不断开战，又不时议和。辛弃疾诞生的次年（1141年），“绍兴和议”成；当他二十五岁时，“隆兴和议”成；到他卒后一年（1208年），“开禧和议”成。与此相联系，南宋朝廷内部主战、主和两种力量，也就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这样的时代，既为其“试手补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促使其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社会现实，又在政治上与精神上使他不断遭受政敌的排挤与打击，因而使他对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肮脏丑恶的政治现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诗穷而后工。辛弃疾词的创作也因此达到了“自有苍生以来所无”的最高境地。

辛弃疾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二十三岁以前的青年时期。辛弃疾祖父辛赞因家累而未能脱身南下，曾出仕于金，但心怀故国，常引领辛弃疾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这在辛弃疾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辛弃疾幼年随祖父的迁调而游历四方。在谯县时，与党怀英同从学于亳州刘瞻，两人才华出众，并称“辛党”。辛弃疾曾两次受祖父之命赴燕

京应试，谛观形势，为抗金做准备工作，谋未及遂，祖父去世。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辛弃疾聚众二千，树起抗金义旗。不久，率部归山东义军耿京，为掌书记。他力劝耿京归宋节制，以图大业。次年，他与诸军都提领贾瑞等奉表南归，不料张安国杀耿降金。他在北返途中得此消息，决然邀约统制王世隆等人，率领五十轻骑奇袭金兵大营，生擒叛徒，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长驱渡淮，献俘行在斩首。壮声英概，警顽起懦，辛弃疾也因此留宋而被委任以江阴签判之职。从此，辛弃疾宦游江南，希望实现其恢复中原的理想。

二、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的壮年时期。这一时期的前十年，辛弃疾对于恢复事业充满信心与希望。“隆兴和议”后不久，他不顾官职低微，先后上《美芹十论》和《九议》，审时度势，力陈复国方略，显示出非凡的经纶济世才能。可是在“谈战色变”的年月里，他的意见未被执政者采纳。十年间，他只是担任江阴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通判以及司农主簿等职，无缘筹措抗金恢复大计。

乾道八年（1172年），辛弃疾出知滁州，开始了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游宦生涯。在此期间，他并未被派往抗金前线，相反，却被派去平定内乱。他由知州而升任提点刑狱，由转运副使而晋升安抚使，虽宦迹无常却政绩卓著。出知滁州，使当地荒陋之气，一洗而空。帅湖南时，创建“飞虎军”，“军威，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在江西隆兴府举办荒政，严明果断，雷厉风行，成绩显著。在江西镇压茶商军的过程中，辛弃疾对所谓“盗贼”的起因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论盗贼札子》中，他尖锐地揭示了贪官污吏害民扰民的种种事实和人民被迫为盗的真正原因；提醒朝廷要“讲求弥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否则一味镇压会损害“国本”。这就显示了其政治上的开明见解与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

三、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的中老年时期。辛弃疾希望国富民强，在任积极有为，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刚直不阿的性格，触

怒了一些权贵。淳熙八年（1181年）冬，他被朝廷言官弹劾，落职罢任，于有为之年退居于江西上饶城外的带湖。在长达十年之久的罢职闲居生活中，辛弃疾看似闲适自得，流连山水，寄情田园，但带湖的风月，并没有使他忘怀抗金统一的夙志，其词不时流露出功名未成、未老投闲的悲愤酸辛之情。淳熙十五年（1188年），爱国奇士陈亮来到瓢泉附近的鹅湖寺与他相会。他俩“长歌相答，极论世事”，以抗金统一的大业互相勉励。会后彼此唱和，写下了《贺新郎》词数阕，表达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坚贞志操。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冬，辛弃疾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在经过光宗召对称旨后，明年秋，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革理财办法，并准备打造铠甲，招募新军。绍熙五年（1194年）又被弹劾罢职，且对他的攻击一直延续到两年之后。

在又一次罢职隐居的八年中，辛弃疾因带湖住宅失火而迁居于铅山期思渡旁的瓢泉闲居，此时他内心矛盾比前十年退居时更为复杂：风波迭起的宦海生涯，使他深感才高必遭忌，功高必受害，只有全身而退，才是自我保全的妙法，因此其词里不时流露出退隐自全、饮酒避害的情绪。他出入佛道，妙解山水，思想上具有了比较明显的出世倾向。然而，时局的安危依然牵系着他的心，抗金复土爱国热情，也仍然在他的内心深处回荡。

四、六十四岁至六十八岁的晚年时期。嘉泰三年（1203年），当权的宰相韩侂胄谋图北伐以保个人权势，起用大批主战人士，辛弃疾也在起用之列。他虽不满韩的为人，且已六十四岁高龄，但仍“不以久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车就道”（黄榦《勉斋集·与辛稼轩侍郎书》）。在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任上，书奏危害农事六弊；行在召对，他又再申《美芹十论》、《九议》之旨，言金国必乱必亡；在镇江知府任上，他积极奋战，遣谍侦察，又拟建立江上万人劲旅。但事尚未成，又因细故遭弹劾，三度罢职。

辛弃疾自六十六岁秋罢居瓢泉后，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

韩侂胄对金用兵，大败，求和。开禧三年（1207年）秋，金人以索取韩的首级为议和条件，韩大怒，再次对金用兵。为了借重辛弃疾的威望挽救危机，任命他为试兵部侍郎。他则力辞而归。八月间得病。九月，宋廷又起用他为枢密院都承旨，但他的病情已十分沉重，于九月十日含恨去世。辛弃疾卒后，韩侂胄死于政变。次年，“开禧和议”成。竟有人追劾辛弃疾迎合韩侂胄开边之罪。忠而见谤，自古而然。其实，正如辛弃疾垂危时所言：“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能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

二

辛弃疾善于诗文，而尤以词名世。其传世之词六百余首，数量之丰，质量之高，都堪称两宋词人第一。真不愧是人中之杰，“词中之龙”（陈延焯语）。

他取得这样高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于文学事业的甘心情愿，他从来也没有把文学事业作为他生命的至上追求。其门生范开曾经在《稼轩词序》中发出过知己般的感慨：“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他本来是把自己的生命追求定位在平戎恢复上。但是辛弃疾事实上的“不遇”，即没有能够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成为挽救民族发展危机的英雄人物，却使他把一腔热血化为文学上的“英雄感愤”。

浩邈深沉的家国之忧，是辛词所抒发的一种重要情感。他白日纵目，每每心系“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声声慢》），“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菩萨蛮》），有时感叹“剩水残山无态度”（《贺新郎》），“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摸鱼儿》）。他夜不成寐，所闻所感是“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即使在“布被秋宵梦觉”后，所念也惟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他对于民族前途的深沉忧患，不因处境的变化而改变。

抗金复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辛词所表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辛弃疾经常以此重任勉励同志。其寿赵德庄词，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其呈史正志词，许以“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其送友人赴任，勉励对方“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而他自己，也同样以抗金事业自我鞭策。他登上南剑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时，深感“倚天万里须长剑”（《水龙吟》）；他为陈亮所赋写的壮词，其实是对自己的期待：“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表现了他自己对于恢复中原的热望和使命感。即使人到老年，遭逢“叶公好龙”之辈，他依然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怀抱：“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就写出了他期望能有人起用老其雄的心愿。此外，在追述往事时，他总是无限缅怀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这些，都表明了他对于抗金复土、建立不世功业的热切希望。

但是，由于南宋集团“忍耻事仇”、“一切不复关念”（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再加上辛弃疾被迫投闲置散的政治遭遇，其词中也抒发了冷落不遇的压抑感。他孤愤耿耿，深感“闲愁最苦”（《摸鱼儿》），初到江南，他就“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晚年罢归，他抚今思昔，痛心于“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愤怒之极，反有时出之以反讽：“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水调歌头》）；“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卜算子》）。他不仅抒发自己的“闲愁”，也对统治者不恤爱国人才的态度加以揭露。他深沉感喟：“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他借古讽今：“汉开边、封侯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八声甘州》）；他进而指责统治者不恤人才：“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总之，这种英雄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不平之鸣”，随处辄发，使其词显示出生气凛凛的抒情个性。

主和派的苟安妥协，南宋王朝的昏暗庸弱，使词人极为愤慨与痛心，在不少词中，他借古喻今，多次以西晋清谈误国的“夷甫诸人”，来痛斥今日“夷甫之流”的苟且偷安的误国罪行。“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当权的主和派不关心人民生死，不关心民族兴亡，他们但知作清高状，令词人忧心如焚：“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贺新郎》）。这些“清绝”的主和派，对主战派人士倒是不惜压抑和围攻，词人不禁激愤地发问道：“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水调歌头》）对于他们，词人坚决痛斥，以鼓噪的群蛙等来揭示其丑态：“袖手高山流水，听群蛙、鼓吹乱池。”（《满庭芳》）。这样的政治批判之作，是辛词里极具斗争锋芒的内容。

除了以上体现为主旋律的重大内容外，辛弃疾还写下了大量的山水词、农村词和理趣词。就山水词来看，他自称是一个“一生不负溪山债”（《鹧鸪天》）的人，在其笔下，的确有“万壑千岩归健笔”（《念奴娇》）的气象。他写青山，时而奔腾而至，似“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时而“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沁园春》），时而与之情融意通：“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他写岩下溪水清澈明畅，宁静优美：“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生查子》）；写钱塘江潮则声威赫然，夺人魂魄：“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词人笔下的山水千姿百态，动静皆美。

辛弃疾的农村词，承苏轼《浣溪沙》组词流风，而较苏词更为多姿多彩。举凡四季田园风光、春秋农事更替、田野劳作、家舍副业、男婚女嫁、民风乡俗，从儿童、少妇、壮夫到野老的多种人物形象，乃至他与农家的友好交往，无不形于笔端。它们像随意摄取的生活小照一样，不仅显示出了词人的闲情逸趣，也使辛词洋溢着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清平乐》〔茅檐低小〕诸词，就是典型的例子。

辛弃疾的理趣词，基本上作于他退居带湖尤其是瓢泉以后，表现了他对于人生观、历史观乃至宇宙观的深入反思。因为“无旁宇宙，人是一黍太仓中”（《水调歌头》）的宇宙大秩序的启示，因为“贵贱偶然，浑似随风帘幌，篱落飞花”（《玉蝴蝶》）的命运偶然性的觉悟，因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官”（《浪淘沙》）的价值幻灭的感悟，也因为“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瑞鹧鸪》）的官场牵累，特别是因为政敌的谗言让他忧谗畏讥：“笑挂瓢风树，一鸣渠碎，问何如哑”（《水龙吟》），他不得不选择“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鹧鸪天》）的生活道路，向往“秋水观中山月夜，停云堂下菊花秋”的隐居闲适生活，他自谓“随缘道理应须会，过份功名莫强求”（《瑞鹧鸪》），并以“人生行乐”的思想来安慰自己。他谈齐物、辨小大，说有无，悟动静、达贵贱、知刚柔、讲顿悟，以道佛思想来重新解释世界，表现了当理想无法实现、自身迭遭打击之后的心理调整需要。当然，调整并没有使他真正安心，直到镇江任上，他还在慨叹“老去行藏与愿违”，还在问讯“何人可觅安心法”（《瑞鹧鸪》）。这说明，对于人生、历史和自然、宇宙的重新参解，并不能完全消除他积极入世、精诚报国的内在热情。

辛词中情词不多，但或雅或俗，也能自见特色。雅者如名篇《祝英台近》〔宝钗分〕，深婉细曲，被人誉为“昵狎温柔，魂消意尽，人才伎俩，真不可测”（沈谦《填词杂说》），俗者如《南歌子》〔万万千千恨〕，则全用口语，颇有生活风情。辛词中的情词不仅有着抒情风格的不同，还有着载意深浅的区别。他的一部分情词，抒写的是纯粹的爱情体验，如《临江仙》：

金谷无烟官树绿，嫩寒生怕春风。博山微透暖薰笼。
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别浦鲤鱼何日到？锦书封
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